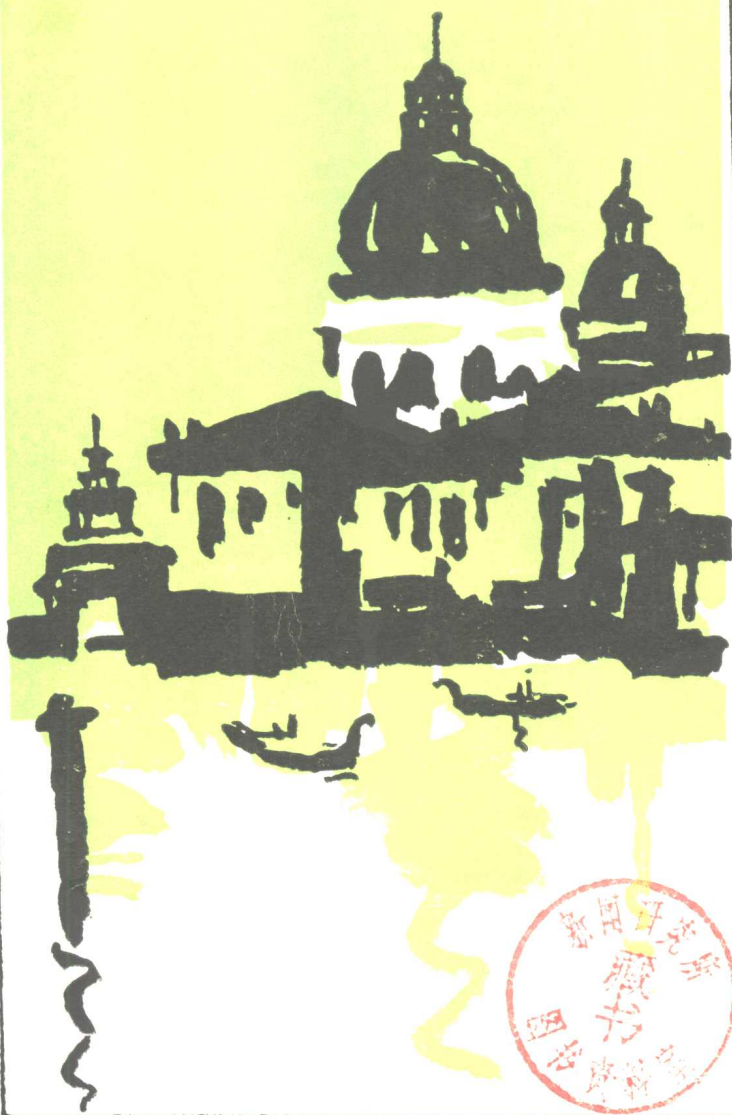


莫拉维亚短篇小说选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

4

016002

莫拉维亚短篇小说选

吕同六译



XWTS 0017205



外国文学出版社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莫拉维亚短篇小说选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161,000 开本850×1158毫米¹/₃₂ 印张7¹/₄ 插页5

1983年3月北京第1版 1983年3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7,000

书号10208·119

定价0.78元

前 言

莫拉维亚是当今意大利的文学名家之一。

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莫拉维亚发表了各种体裁的作品近四十部。在意大利，他的作品经常获得各种文学奖金，并被竞相搬上银幕；在国外，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批评界对他的创作历来意见分歧，有的批评家把他当作新现实主义的代表，虽然他的整个创作同新现实主义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他本人也一直否认同新现实主义的关系；有些批评家把他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也有的学者把他视为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先驱，等等。梵蒂冈则不断攻讦他的作品，1952年曾发表通谕，把他的全部作品列为禁书。在意大利当代文学史上，还不曾有过一位作家，象莫拉维亚这样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和如此广泛的议论。不过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莫拉维亚的生活和创作，始终带着社会生活升沉运动的印记；半个多世纪来意大利社会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精神面貌，在作家各个时期的作品中，都留下了痕迹。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Alberto Moravia), 1907年11月28日出生在罗马。他原名阿尔贝托·平凯尔勒 (Alberto Pin-

cherle)。父亲是位画家、建筑师。九岁那年，莫拉维亚身患肺结核病，被迫卧床治疗。长达九年的医疗和休养，使他失去了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的机会，但他以顽强的意志和强烈的求知欲，刻苦自学，阅读了大量书籍，意大利和欧洲古典文学更是深深吸引了他。他从文学大师的作品里汲取滋养，为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5年，莫拉维亚病愈，时值法西斯当政。据作家自己说，疾病和法西斯统治，是决定他的生活和创作道路的两个主要因素。他前往北方山区，用三年时间埋头写作，于1929年发表了第一部小说《冷漠的人们》。莫拉维亚采用心理分析的手法，描绘了置身于污秽现实的资产阶级：私利主宰道德，冷漠扼杀热情，空虚、堕落的精神状态。文笔虽然含蓄隐晦，但可以看出，作家对资产者的灵魂作了鞭笞，因为他认为，正是这些人的虚伪自私和否定理想的冷漠态度，成了繁殖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土壤。这部处女作轰动了当时的文坛，在准备刊印第六版时，遭到法西斯政权的查禁。

嗣后，莫拉维亚不得已而出走欧美各国。这期间，他于1936年远涉重洋，来到我国访问，中国古老的文明给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三十——四十年代，莫拉维亚的作品或继续表现《冷漠的人们》的主题，或描写企图“违抗”现实，冲破环境的精神牢笼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徒有“抱负”，但“随波逐流”，最终成为失败者。如《未曾实现的抱负》（1935）、《阿谷斯蒂诺》（1944）、《罗马女人》（1947）、《违抗》（1948）、《随波逐流的人》（1950）以及《鄙视》（1954）。莫拉维亚成功地塑造出了一系列具有民族特征和时代特征的典型形象——精神空虚、庸俗自私、意志薄弱的“冷漠的

人”，从一个侧面描摹出时代的气氛。

还有若干作品跳出了这一题材框框，别开生面。《假面舞会》问世于法西斯统治岌岌可危的1941年，表面上是揶揄一个假想的南美专制国家的独裁者，实际上是向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抛出投枪，指桑骂槐。《瘟疫集》(1944)立意新颖奇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形现象，进行了辛辣的嘲讽。

《假面舞会》问世后，墨索里尼亲自下令禁止该书再版。法西斯覆灭前夕，莫拉维亚被列入黑名单，险遭逮捕。他逃出罗马，过了九个月颠沛流离的难民生活。

意大利人民开展的波澜壮阔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充满生气的新现实主义文学的崛起，对莫拉维亚战后的创作无疑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罗马故事》(1954)、《罗马故事新编》(1959)和“献给抵抗运动的小说”《乔恰拉》(1957)，是莫拉维亚把目光投向意大利下层社会的成果。前两部作品生动多姿地展示了战后初期罗马普通人备受生活煎熬的艰辛命运。后者以作家亲身经历的逃难生活为素材，通过罗马一个女店主及其女儿的遭遇，对墨索里尼政权崩溃、德国法西斯入侵期间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势，作了别具一格的剖示。它们是战后意大利现实主义文学的杰作。

从六十年代起，莫拉维亚一连发表了长篇小说《愁闷》(1960)、《注意》(1965)、《我和它》(1971)和五部短篇小说集。异化，是贯串这些作品的主题。

其后，长篇小说《内心生活》(1979)，掀起了另一场轩然大波。在这部历时七年，七易其稿方才写成的书中，莫拉维亚摒弃了传统的手法，以“采访体”的形式，让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女青年侃侃自叙她对家庭、阶级和社会的反叛经过。作者着力写出女

主人公的心理矛盾和思想演变，并进而探索这后面隐藏的社会问题。女青年——或者说一代青年——的“内心生活”，成为震动意大利的1968年学生造反运动时期社会生活的折射。教会以“有伤风化”为由，再一次对莫拉维亚发动讨伐。

最近，莫拉维亚刚完成了一部新的长篇小说《1934》。据作家在接受采访时说，小说的情节围绕同德国纳粹主义的关系展开，侧重写主人公——一个意大利青年知识分子——由于痛苦、失望而陷入精神危机，萌发了自杀的意念。

莫拉维亚的才华和兴趣是多方面的。除了主要从事小说创作，他还发表过剧本，如《世界就是如此》、《生活是游戏》，写过多部电影、电视脚本。他对古典文学和文艺理论也颇有造诣，评论集《人就是目的》汇集了他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他酷爱旅行，足迹遍及五大洲，先后写了四部游记。莫拉维亚现在是《新论证》杂志的主编之一，《快报》周刊电影专栏评论员。五十年代，曾任国际笔会主席。

二

在莫拉维亚的整个创作中，短篇小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迄今发表的短篇小说集计九部，总数近五百篇。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应该说，短篇小说更集中地反映出莫拉维亚创作的思想内容及其演变的轨迹，更鲜明地体现出他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

本书所选的短篇，采自《瘟疫集》（1944）、《罗马故事新编》（1959）、《不由自主》（1962）、《东西就是东西》（1967）、《天堂》（1970）、《另一种生活》（1973）、《嘿》（1976）七个短篇集。从创作

的时间看，既有四十年代和战后初期生活景象的勾画，又有当前西方社会生活变故的反映。

《瘟疫集》里的短篇又称“超现实”的讽喻故事。在《橱窗里的幸福》、《月球特派记者发自地球的第一个报告》中，莫拉维亚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和极其大胆的夸张，把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世人对幸福的渴求和凄凉的失望，作者的强烈感情，别出心裁地融汇于“超现实”的、童话式的故事之中。“超现实”，实质上是莫拉维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透视现实，评价生活的一种巧妙的方式。对资本主义种种畸形现象的嘲讽，在这里取得了出乎意外的艺术效果。

《罗马故事新编》是《罗马故事》的续篇，最初曾陆续刊登于米兰《晚邮报》。在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里，作者没有正面描写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而是把焦距放在罗马社会底层的日常生活上，或者如作者所说，故事的内容都是“奇谈偶闻，或者小小的新闻”。这些故事的主人公都是最普通、最卑贱的小人物：流浪汉、失业者、小偷、侍者、仆役、厨师、工人。

这些为资产者的罗马所不容的不幸的人，蒙受着生活上、精神上的深沉的痛苦和创伤，人的价值被降低到了极其可怜的地步。他们为了争得生存的权利，只得去干犯罪的营生（《抢劫》），或者接受低级无聊的差事（《红雨衣》）。他们苦苦挣扎在饥饿线上，忧伤象影子一样永远攀附在他们身上（《艾丽维拉的眼泪》）。为了摆脱令人难堪的屈辱，他们不得不诉诸可笑而又可悲的方式来寻求精神上的满足（《中国瓷瓶》）。

莫拉维亚善于从日常生活现象中，抓住那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加以简峭的勾勒。《别了，乡村》、《结婚礼物》中叙述的故事，都是平淡无奇的，但作者并不是孤立地描写它们，而是凭

借自己观察事物和钻探生活的能力，把这样的描写同反映社会的本质特征结合起来，通过一对乡村恋人的分离和两个莫逆之交的朋友的感情破裂这类凡人小事，对资本主义大都会罗马的恶性膨胀，资本主义势力不只吞噬土地、菜园，而且戕害人的灵魂的图景，作了形象的描画。平凡中见真实，普通处见本质；这些司空见惯、未必为人注意的生活现象，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畸形关系，揭示了尖锐、深刻的社会矛盾，容量有限的短篇小说，获得了可观的深度和效果。

《罗马故事新编》不啻是罗马底层生活的又一幅画卷。作家以艺术的雕刀，为当代意大利文学的人物画廊塑造了善良、纯朴的小人物群像，把他们的希望与悲哀，欢乐与呻吟，他们艰辛困苦的人情世态，栩栩传神地呈献于读者的面前。

在一些短篇中，作者也常常过分夸大资本主义现实的力量，主人公在邪恶的现实面前显得那么渺小、软弱、可怜，受到命运的播弄，而又无可奈何。这使作品蒙上了一层伤感的色调。

三

《不由自主》是六十年代问世的头一部短篇小说集。这时，莫拉维亚又重新把目光投向资产阶级生活的圈子，着重描写进入“福利社会”以后中小资产阶级的精神面貌，从而标志着莫拉维亚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部集子的“卷首语”说，同《罗马故事》比较，《不由自主》明显地反映出“作家的兴趣和作品的历史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确实是引人注目的。收入丰厚、生活优裕、富于文化教养的医生、律师、艺术家、商人、高级职员以及具有同样社会地位的年轻聪

明的女性，取代了战后初期挣扎于饥饿线上的罗马底层的小人物，他们无须再为获得一小块面包或寻找一个糊口的工作而苦恼或铤而走险，然而，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被另一种苦恼所折磨。

有时，他们安享富裕的生活，仿佛醉酒一样，处于兴奋的状态，觉得生活中的一切都很有意义、很实在，但一觉醒来，突然感到一切都毫无意义，一切都是虚伪和空洞的。一个家庭生活素来十分美满的主人公，兴致勃勃地约定和妻子星期天去郊游，欢度结婚纪念日，但清晨醒来，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为什么要去郊游，一种莫可名状的孤独、愁闷的感觉，咬噬着他的心灵，最后竟至迫使他企图驱车冲入湖底，以求解脱（《不由自主》）。另一短篇里的女主人公嫁给了百万富翁，过着挥金如土、骄奢淫逸的生活，但她整天无聊得发慌，内心焦躁、茫然，不晓得如何打发日子，似乎自己活生生地被排斥于生活之外（《贵妇人》）。

显然，莫拉维亚希图借助这些故事展示资产阶级诚然有着优裕的物质生活，他们中有的人是多情的妻子，有的是腰缠万贯的丈夫，但他们的幸福是虚假的；生活仿佛象《不由自主》里主人公的自动电唱机，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脱出常规，出现意想不到的毛病，给人带来忧愁和苦恼；这种忧愁、苦恼全然是不可捉摸和意想不到的，是“不由自主”的。

这种“不由自主”实质上是异化的一个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一旦获得梦寐以求的物质文明，就立即被他所占有的物质所包围，成为它们的附属品。人沦为他拥有的众多机器中的一台机器，而且是故障最严重的一台机器；同时，生活变得象机器一样全靠外力和惯性的机械运动（《机器》）。人受到物的压抑，精神上遭到折磨，失去和谐发展的可能，失去本来的真实的面孔，异化为畸形、丑陋的人。最豪华、最现代化的汽车、电视

机、洗衣机、电冰箱、家具的占有者，无一不是丑陋不堪、灵魂空虚的俗物(《比你更漂亮》)。

这样，人失去了人的价值，失去了人的本质，从而沦为自己的异己者。个人与自我的关系扭曲了，畸形化了，出现了互相矛盾、格格不入的双重的“自我”。这双重的自我如果各自单独存在，一切就合理、圆满、正常；如果合二为一，则产生矛盾、荒唐、反常(《梦幻》)。人的自我本质变得支离破碎，是人的异化的一种表现，也是莫拉维亚六十年代以来短篇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莫拉维亚笔下的人物不仅失去了自己的本质，成为自我的异己者，而且无法同周围的人建立明确的真实的关系，从而相互成为异己者。《不由自主》里的主人公在愁闷的时候，瞧见妻子领着两个儿子走进房间，突然觉得，今天仿佛是初次见到自己的妻子，感到异常陌生。一个男子下班回家，在一个陌生的地点遇见一位陌生的美丽女子，他心里一动，便鼓起勇气紧紧尾随，激动得心怦怦乱跳。最后他骤然发现，自己跟踪的那位陌生的美人，就是他的妻子！那陌生的地点则是他住的公寓所在的街道(《房间与街道》)！更有意思的是，一对新婚夫妇在教堂隆重举行婚礼后两小时，乘火车离开罗马去开始蜜月旅行。旅途中，他们越是谈话、接触，越是觉得互相不能理解，没有共同的语言。转眼间，刚刚结合在一起的新婚夫妇，成了仿佛互不相识、只是偶然在同一车厢里相遇的陌生旅客(《蜜月旅行》)。人与人之间，甚至夫妻之间，都存在着隔膜，无法沟通思想和感情，连最亲密的人也失去了真实的本质，呈现出不可辨认的陌生的面孔，化为幻觉！

莫拉维亚从描绘个人与自我、个人与个人之间对立的畸形

的关系出发,进而表现个人与现实之间格格不入的畸形的关系。意大利经历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和战争浩劫,经历了战后初期的严重动乱和经济萧条,到五十年代末,它的经济开始迅猛发展,一跃进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当时舆论界不无骄傲地把这一飞跃称作“经济奇迹”,宣扬意大利进入了“新资本主义”、“福利社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福利社会”的魅力逐渐消失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无休止的政治动乱,声势浩大的罢工浪潮,向传统和信仰进行最大胆挑战的青年反叛运动,形形色色政治思潮的泛滥,使这个社会固有的矛盾和派生的灾祸一齐迸发出来,使人陷入失望和忧虑之中,感到前途茫然和不可捉摸。现实也失去了原先的面孔和真实的本质,失去了现实性,转化而成非现实和虚无,或者说梦幻。“梦幻具有现实的某种模样,而现实具有梦幻的荒诞。”因此,人无法同现实建立直接的真实的关系,而只能借助梦幻来同现实建立间接的似是而非的关系。

莫拉维亚的某些短篇,专门写人由于无法把握现实而沉浸在梦幻般的错觉中,干出了不少蠢事(《出于嫉妒的玩笑》、《阴差阳错》),或者干脆写梦游症患者的离奇行为(《梦游症患者》)。所谓梦游症患者,就是一种严重异化了的人,他们失去了自己,失去了自我意识。他们把梦幻当作现实,视现实为梦幻,生活在现实与梦幻的交织之中,而这两者真真假假,扑朔迷离,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微乎其微的。

人既然无法用旧的认识手段把握已转化为虚无和非现实的现实,同它建立可靠的关系,那么,他在现实中也失去了生存的条件,找不到一席安身之地。因此,他们执着于梦幻和梦游症,甚至对此比醒着更喜欢,只是为了从梦幻中寻求生存的条

件,寻求慰藉和解脱,其实也是一种自我陶醉(《中国盒子》)。

莫拉维亚以这种非凡的洞察力,展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令人骇然的混乱、反常、荒谬和沉沦,展示出它的无法解决的矛盾和分崩离析的危机。当今西方社会里许多新的异化的现象,得到了清晰的形象的再现。

莫拉维亚同写异化题材的某些西方当代作家不同,他不是采用极其隐晦或纯粹象征的手法,而是比较明确地指出,人的种种荒唐和反常行为的渊藪,是现实本身的荒唐和反常。一个漂亮的电影女明星,享有世界声誉,到处受到欢迎和崇拜,但她却感到无比的孤寂和郁悒,常常伤心落泪。在那个拜物主义世界上,她这个明星已失去了人的价值,转化为物,成为受市场控制的“高档商品”。她仿佛被安置在商店橱窗里的样品,供人观赏,所有的过客都瞅着她,可是任何人不能接触她,她也无法接触任何人(《女明星》)。一家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在飞机上的打扮和举止活似天使,回到地面后,她跟男朋友们厮混,完全过着另一种生活。她想改弦更张,但又偏偏跟一个她毫不喜欢、但热烈追求她的丑八怪似的阔佬相好。她无可奈何地得出结论:“生活中最可怕的东西,正是生活。”

冷酷无情的现实生活是一种可怕的神秘的力量,沉重地压迫着人的心灵,剥夺人的尊严和价值,切断沟通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桥梁,造成不可逾越的鸿沟。

诚然,莫拉维亚在描写人的莫可名状的受压抑、苦闷的精神状态和不可思议的怪诞行为时,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一定影响,但作家并没有把这一切简单地写成人物某种潜意识的突然爆发或病态的生理现象,而是以精神分析学为武器来揭露当今西方社会的种种病态现象。如果说,莫拉维亚在前期所写的

作品《冷漠的人们》、《随波逐流的人》、《鄙视》等中，描绘了以冷漠、自私、虚伪为特征的资产阶级道德上的堕落，那么，在六十年代以来的短篇小说中，则揭示了这个道德堕落的过程沿着怎样的新方向在发展。莫拉维亚在这一代资产者身上着重揭示的，则是个人失去自我的本质，对周围的人和对现实世界都成为异己者的生存危机，空虚、迷茫、无所适从、悲观颓丧的精神危机。用意大利评论家的话来说，莫拉维亚“反映了现代人的孤独”和“当今社会里人所处的非人的地位”。资产阶级，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佼佼者，居然异化为“非人”，这在今天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难怪长篇小说《愁闷》的主人公感叹地说：他所属的阶级（资产阶级）过去是不为异化所困扰的，因为它使下层阶级异化，而现在，它却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异化的异化中！莫拉维亚以他的锐利的解剖刀，无情地剖析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揭示出物质生活的高度发达和丰富必然伴随着精神生活的高度贫乏及思想危机的不断深化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病症。

莫拉维亚曾说，他的小说“既没有正面人物，也没有反面人物”。他的短篇小说里的主要人物虽然集中体现了中产阶级孤独、苦闷和在社会上找不到支撑点的心理危机，然而，他们又并不都是或始终是冷漠、倦怠、丧失任何理想之光而又徒然在逸乐、色情、冒险中寻求生存的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厌恶，精神生活失去平衡的痛苦，常常迫使他们转而采取挑衅、叛逆和造反的态度，企图借此求得同现实和他人的关系的新的平衡，这是莫拉维亚六十年代以来短篇小说中最常见的另一个主题。《想象》的女主人公每逢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时，敢于蔑视和摒弃现实给她安排的选择，拒绝妥协，而硬是要承担风险，独自另寻出

路。一个嫁给珠宝商的女子，为丈夫献出了一切——青春、美貌、才学，而作为交换，她只不过成了丈夫开设的珠宝店的一名伙计。财富造成了夫妻关系的严重不平衡，她决意盗窃丈夫店里的最珍贵的珠宝玉石，把它们扔到台伯河里去，借以表明她不单纯是丈夫的伙计，从而能够重新爱他（《平衡》）。

他们跟现实格格不入，厌恶现实，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对社会表示叛逆；他们丧失了旧的价值观念，但又无法寻找替代的价值观念；他们追求生活中缺少的某种东西，或者追求某种理想的生活，但又崇拜现实生活中最龌龊的东西，无法摆脱那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各种矛盾。他们掀起的充其量只是茶杯中的风波，结局差不多总是失败，跟环境同流合污，得到“另一种生活”。正象俗话所说，“天堂虽然存在，但虚无飘渺。”这种愿望与行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反映了当代资产阶级在深刻的社会矛盾和严重的精神危机面前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特征，是理想和信心的毁灭。莫拉维亚自己曾说：“我的人物是悲观的，但不是怀疑主义者。他们都在努力寻找出路，但还没有找到。”他们“正处于意识到自己面临的问题的阶段，或者说，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但还无力解决。”

四

莫拉维亚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上独树一帜，具有独特、新颖的艺术风格。如果说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潜意识、意识流等表现手法的印记，那么他的短篇小说则较多地继承了历史悠久的意大利短篇小说的传统，基本上采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

莫拉维亚的短篇小说短小精悍，少则三千字，多不过五六千字。作家善于把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最普通、最常见的横断面截取下来，进行艺术构思，熔铸成概括凝炼的作品。小说往往开门见山就把矛盾冲突勾画出来，象电影的特写镜头，推到读者的眼前，作为推动情节在尖锐的矛盾中发展的契机。莫拉维亚充分施展他驾驭材料的娴熟才能，运用简峭流畅的笔触，从容不迫、轻松自如地描叙故事，展开矛盾。在情节的进展中，作家又擅长寓新奇于平淡之中，通过活生生的富有戏剧性的细节，敏捷地把冲突推向意想不到的高潮，使比较平凡、简单的情节中突起波澜，产生触目惊心的效果。

在对人物的描绘上，莫拉维亚也不落俗套，他凭借观察事物的敏锐目光，善于捕捉住最富于个性色彩的特征和细节，使用极其普通而又准确的字眼和状物传神的譬喻，三言两语，寥寥数笔，使人物形象鲜明活跃于纸上。《结婚礼物》里的普拉契多、《穷汉》里女主人公的丈夫等人物形象，就是这样卓荦而立的。

有时，莫拉维亚又适当借鉴现代派文学的艺术手法，突破故事情节和时空的制约，从刻画人物的意识、心理落笔，选取若干个近镜头，多层次地展示人物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流浪汉》、《女明星》）。

莫拉维亚的短篇中常常写梦，其手法变化多端，曲折有致。有时人物眼睁睁地醒着，其实是在梦中；有时酣然沉睡，进入梦幻状态，却又分明醒着；有时又把读者不知不觉地带入梦中梦、连环梦中。作家不是为写梦而写梦，而是为刻划异化了的人失去自我意识的病态的心理活动，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更好地揭示小说的主题思想。

作家的文字朴素，简洁，不事雕饰，既具有民间口头语言的

生动性，又有着文学语言的精确性，朴而不俗，直而不拙，富有很大的艺术表现力。这些都是使莫拉维亚的大多数短篇小说既写得含蓄、深刻，又栩栩如生、引人入胜的原因。

莫拉维亚短篇小说的另一个重要的艺术特色是，他把冷静的笔调、细微的刻画同哲理性论述揉合起来，加强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掘发。莫拉维亚象剥笋皮似的步步深入地剖析人物的精神状态，自然贴切地运用各种各样形象的譬喻，阐发对现实、对人生的看法，使小说既朴实生动，又富于哲理性的思考。这些哲理性论述立论精辟，闪烁着思想的火花，起着深化作品主题的画龙点睛的作用，是理解小说思想内容的钥匙，也加强了对现实的批判锋芒。这是莫拉维亚六十年代以来小说创作中出现的一个新特点。有些评论家把这样的作品称作“论述性小说”。

综观莫拉维亚的短篇小说创作，不难看出，作家在许多短篇中，剥下了当今资本主义世界诱人的五彩缤纷的外衣，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深刻矛盾、荒唐而又畸形的社会，看到了它的阴暗、反常、分崩离析的特征；对西方资产阶级陷入的不可救药的精神危机，对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可悲的畸形关系，也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批判。作家观察事物的敏锐眼光、艺术概括的能力和娴熟的技巧，对我们也具有借鉴的作用。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莫拉维亚勇于揭示当代西方社会的真实，诚然这只是部分的真实。揭示真实的作品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启发我们去思索。而不认识世界和进行思索，又怎能更好地生活呢？

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莫拉维亚作为一个有才华的作家，也没有能够完全冲破精神分析学和怀疑主义的藩篱。他以严峻的态度，淋漓尽致地刻画这些既不是反面人物也不是正面人物